

· 科技与社会 ·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 STS(PSTS) : 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场域

王彦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进入 21 世纪,学界兴起了一股呼吁 STS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PSTS) 的呼声,针对这一思潮,文章就 STS 是否应强化公共知识分子角色、PSTS 所应关注的问题域、所提供的知识的特征、所应遵循的规范体系,以及 PSTS 的未来演化逻辑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解读,最后,分析了 PSTS 理念对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启示。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 ASTS; PSTS; 精神气质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15) 06 - 0092 - 07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西方及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研究思潮。雅各比(Russell Jacoby)、布迪厄(Bourdieu Pierre)、C. 赖特·米尔斯、许纪霖等学者就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社会责任及当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集体缺失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由早期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一词演化而来。^①依据通俗看法,“知识分子”主要指那些具有思想独立性和社会正义感且敢于向社会公众表达自身观点的知识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及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被人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如美国的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等,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评论,并将之发表于《纽约书评》等发行量较大的通俗刊物上。通常看来,知识分子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1) 道德层面: 被认为

是普适价值观(如正义等) 的坚守者,^[1] 负载着很多的道德元素;(2) 公共化层面: 包括议题的公共化、语言的公共化、行动的公共化及听众的公共化;(3) 知识层面: 能够透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与一般的流言或通俗性知识区分开来。^②而“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由美国哲学家雅各比于 1987 年提出,^[2] 相比“知识分子”概念,其内涵并没有太多变化,之所以在“知识分子”概念提出近百年之后重新加上“公共”二字,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学的成长,知识分子被日益吸纳到科层化的知识生产、评估及奖励体系之中,“专门化推动他沉没于学术圈中”^[3]。这使得传统的知识分子逐步丧失了对公共社会问题的感知、分辨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甚至于在现代社会构建理念及构建实践中被抛弃,因此社会希望体制内研究人员更多地恢复其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生产更多具备“公共性”特征的知识。

【收稿日期】 2014 - 08 - 18

【作者简介】 王彦雨(1982 -) 男,山东巨野人,博士,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 STS、科技政策。

① 一般看来,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一词始于 19 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 Alfred) 事件,1894 年,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人诬陷被判入狱,当时一些具有正义感的作家、教授如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 以“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o of Intellectuals) ”的名义发表了反对监禁德雷福斯的抗议书,“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

② 以下三种情况便不能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1) 仅专注于研究自然现象、不关注公共议题的那部分科学家,因为知识仅仅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2) 一些有影响力、关注公共性社会或政治议题,但写作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士的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及其《正义论》;(3) 服务于特定社会利益群体的专业性智囊。

一 STS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PSTS) 的呼声

进入 21 世纪, STS 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呼吁 STS 强化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以下称 PSTS) 的呼声, 如比克(Wiebe E. Bijker) 在 2001 年的 4S 会议上, 呼吁 STS 学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21 世纪需要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 而 STS 研究者则可以填补这一空白。”^[4] 史蒂文森(Sharon McKenzie Stevens) 认为“STS 能够超越单纯的学术性研究范式……STS 及人类学研究需要学习面向公共听众的新研究方式。”^[5] 731-732 何谓 PSTS? PSTS 是与学术型 STS(以下称 ASTS) 相对而言的, 后者将自己的任务限于对(科学和技术) 知识具体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 学术创新和同行认同是其关注焦点; 而 PSTS 则试图打破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学术性角色难以与其公共角色有效地整合在一起,^[6] 积极关注社会及公共科技议题, 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并用 STS 的相关研究方法解释这些现象、或参与到事件之中, 并积极掌握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对话的语言形式和相关技巧(两者区别如图 1 所示)。

	ASTS	PSTS
功能导向	学术创新	社会影响力
关注点	科学知识生产	社会议题或公共科技事件
语言特征	专业性术语	通俗性语言
知识特征	内行性/非即时性	公共可理解性/即时性
评评方式	同行评议	社会评估
自我定位	道德、价值无涉	强调公共伦理责任
传播方式	专业学术媒介	公共传播媒介

图 1 ASTS 与 PSTS 之间的差异性

1. 比克的“民主化之路”。比克认为, 当前 STS 应突破传统的认识论之栅, 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 “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一个具有更广泛特征的 STS 议程, 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 如社会秩序、国际和平、地方及社会安全、民族及宗教认知, 以及民主等应该被 STS 所重新提及。”^[7] 445 比克主张 21 世纪 STS 应采取“民主化之路”, 认为 STS 不仅在理解科学和技术文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同时还应该在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STS 研究者应该更进一步, 在技术文化的民主化过程做出积极贡献, 向更广泛的听众——政治家、工程师、科学家及普通公众——表明: 科学和技术是价值负荷的, 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科学和技术的影响, 科学和技术在保持社会统一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同

样科学和技术在危害社会的稳定性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比克认为, 对科学和技术的分析应与政治讨论结合在一起, “无论是以明确的形式, 还是通过含蓄的方式”^[7] 444。

2. 库依曼(Ellen Cushman) 的“行动主义方案”。库依曼提出了 STS 的“行动主义方案”, 在他看来, STS 不仅要学习面向公众的新言说方式, 还要积极走进社会实践, 缺乏行动力的研究难以仅仅通过思想启蒙而保持持续的生命力。库依曼主张将研究、教育、服务等责任相互衔接起来, “推进服务学生及当地性的社区成员的目标”^[8] 330。库依曼希望 STS 研究者积极成为当地性共同体中的成员, 而不是与他们保持距离, 通过与当地性成员的直接互动来改变现状、启发公共智慧, “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的服务、教育、研究为那些处于大学内/外的人提供智慧, 使他们的知识能够在超越大学的与境中产生政治影响。”^[8] 335 库依曼的这种观点与富勒(Steve Fuller) 相似, 后者也重视“观点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以寻求观念、知识及行动的新的可能性。^[9]

3. 里纳(Rayne) 的“公民权益模型”。里纳的“公民权益模型”赋予了 STS 更多的道德责任, 认为 STS 可以通过对“认知正义(cognitive justice)”的追求来促进正在出现的社会团结。公民权益模型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1) 将知识分子的“求真”目标与“求善”结合在一起, 突出对社会正义的追寻与维护; (2) 将知识视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STS 应使公众明白: 拥有足够的知识是实现社会民主的重要工具, 用知识武装自身才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使公众认识到“基于知识的民主”的重要性; (3) 强调对社会实践的参与, “鼓励学术研究者反思如何运用他们自身的智力活动来支持特定的参与实践, 并参与其中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思考‘参与’”。^[5] 735

二 我们是否需要 PSTS

STS 是否需要强化自身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呢? 对于这一问题, 不能仅仅从道德层面进行解读, 还应从社会的知识需求结构变化、STS 内在发展逻辑以及两者所形成的张力空间来加以分析。波斯纳(Richard Posner) 曾用市场供需关系来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 认为规模较为合理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M) 的形成, 应在“社会对特定类型公共知识的需求(D)”与“此类知识的供给量(P)”之间形成

契合关系,即 $D \leq P$ 。对于 STS 来讲,当前 STS 尚没有担负起向社会贡献其所需要的公共知识的责任,不断扩大,一个不断扩大的“S2/S3 类公共知识”^①需求空间已经形成。当代科学的重要特征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将激增”,^[10]这一方面源于科学家在特定时间段内往往难以对特定的科学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在于“研究”活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往往不可控,特别是在创新性规范的激励下,科学家往往从事一些具有广泛争议的研究活动(如私人性的克隆人实验等)。因此,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公众,均希望获得更多、更优质的 S2/S3 类知识——决策者希望借此提升决策的合理性程度,而公众需要了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对自身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此外,当前科学与政治、经济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共谋”关系,科学家或决策者的论断并非完全客观,因此公众需要更多所谓“权威消息”之外的“第三方”知识,而 PSTS 具有担负起此类职责的能力。

从公共知识供给层面看,当前 STS 在很多情况下徘徊于社会公共事务之外。一直以来存在一种观点,即学术研究是为了追求真理而非社会应用,“学术研究者最好是适应其学科内的研究目标。”^[11] STS 在兴起之时非常关注各种公共社会议题,而随着 STS 事业的建制化,它逐步转向认识论领域,解释“科学和技术是如何被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所形塑的”^[12]。其后果是,STS 逐渐远离了公共社会空间。这种研究模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了广泛批判,如科岑斯(E. Cozzens)认为在一系列社会运动中,STS 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时代的社会民权运动中,STS 能否找到自己的根源? STS 在那里吗,参与了吗?”^[13] 马丁(Brian Marti)也认为,STS 的学术化倾向使得那些试图从 STS 相关理论中获取变革社会启发的人来说,“沮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力图通过扩展现有的分析来创造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14] 依拉贝格(J. Illebaig)则发现 STS 的两种文化(行动者文化和学术性文化)间存在明显隔膜,如在 4S 会议上,来自爱丁堡和牛津的 STS 学者(学术性文化)与来自澳大利亚和德国的 STS 研究者(主要是行动主义)“甚至不愿穿越走廊到另一方的会场去与之进行见面或阐释自己的思想”^[15]。

从知识供给类型层面看,STS 可提供 S2 类知

D 与 P 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

从社会需求层面看,随着后常规科学空间的不断扩展,且强调“对称性”分析方法,这有助于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理解。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但对话往往不彻底,因为科学活动拥有较强内行性特质的理论、实验及方法系统,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不同文化间的隔膜与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往往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来审视其他文化(如伦理学家往往单纯地用伦理原则来要求科学),使得沟通以“不可通约”方式进行,并往往陷入要么妖魔化、要么盲信科学的两极态势之中。科学与社会合理关系的构建需要 S2 类知识——打开知识生产黑箱,真正走进、理解科学,在相互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互动,而非单纯地诋毁或盲目崇拜。

此外,强化 STS 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可以为 STS 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STS,特别是传统的建构论研究传统,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如合法性危机(反身性危机)、思想解放能力的弱化(“so what”质疑)、方法创新乏力等,对此学界已经进行了新探索,如唐纳德·麦肯齐呼吁“不要把 STS 做小了”^[16],要将 STS 相关理论运用到新领域(如经济、法律等)中去。而强化 STS 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则是从“功能层面”来反思 STS 的未来发展路径,积极扩展 STS 的功能空间,对于 STS 来讲,这是摆脱当前发展困局的一种新思路。

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PSTS

从 ASTS 转为 PSTS,意味着 STS 在一定程度上重构自己的研究主题、写作方式、行为规范以及听众结构。我们强调一个具有社会担当、具备专业性和公共性品质,具有自身独特精神气质的 PSTS 的存在:

1. 问题域层面的 IPRC 原则。IPRC 意在塑造一个“有社会担当”的 PSTS 形象:(1) 界面性(Interface): PSTS 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处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交界面,这些问题源起于科学技术演进与社会发展之间所形成的各种紧张关系;(2) 公共性(Public): PSTS 强化了对公共科技事件的反思与研究,这些事件往往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或焦虑,同时

① 在这里,我们将与科学和技术活动相关的知识分为三类:一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简称 S1 类知识),是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所掌握的专业性科学和技术知识;二是关于科学和技术生产过程的知识(简称 S2 类知识),它打开了科学、技术知识生产过程的“黑箱”,进入到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生产现场;三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型知识(简称 S3 类知识),如科技与伦理、健康、安全等,它源于科学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可称之为后常规科学空间中的知识。

能够将特定历史与境中与科技相关的潜在社会困扰提升为显在的“可讨论的公共议题”；(3) 即时回应性(Response)：对公共科技事件做出即时性评论，在公共科技事件暴发之初或之后的较短时间内较快地提出观点及建议，“事后诸葛亮”式的回溯式分析模式虽然重要但并不足够；(4) 关键性(Criticality)：优秀的 PSTS 不会回避“将社会及文化结构体系中较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这一历史任务，应聚焦于重要、关键而非细枝末节的议题。

2. 知识供给层面的 NFP 原则。NFP 强调一个具有专业性和公共性可理解性特征的 PSTS 的存在：(1) 规范性(Normative)：PSTS 不拘泥于传统的描述功能，而是积极向人们提供更多具有行动导引性的知识，能够告诉人们“我们面临着什么”、“我们能够做出何种选择”以及“我们的选择将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些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当前与境的判断及未来行动路径的选择；(2) 基于证据且通俗(Falsifiability and Popularity)：PSTS 所做出判断必须是专业性的，具备可验证性特征，与一般的谣传、世俗断言区分开来，同时 PSTS 应该是懂科学、拥有基本的科学素养的，否则很难应对科学家的质疑，也难以承担起为公众解惑答疑的社会责任；另外，PSTS 反对过度使用晦涩的专业性术语，知识的公共性是 PSTS 的核心特征。

3. 知识评估层面的“开放式评价(OV)”原则。“开放式评估”强调 PSTS 所提供的知识不仅需要接受学术同行的评估，还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评估，因此除了运用同行评议形式之外，还会涉及诸如网络评估、公众调查、大众传媒评估等新型知识评价方式，这是一场新的学术冒险运动。

4. 精神气质层面的 PPTDU 体系。PSTS 是 STS 共同体中的世俗者，他需要考虑社会事件，但 PSTS 也是世俗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怀有一颗捍卫社会道德良知的心，基于这一核心特征，PSTS 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a. 积极入世原则(Participation)。是指 PSTS 积极参与公共科技争论，并努力推动事件的解决，在 PSTS 看来，凭空想象的理论往往会偏离实际，PSTS 不应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外在观察者，他努力介入现实社会并在行动中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

b. 遵循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PSTS 强调务实态度，遵循比克所言的“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t philosophy)”，^{[5]732}既不应愤世嫉俗、加入到“解构科学”的后现代狂欢阵营之中，亦不应过于理想

化而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需立足于当下，对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基于 STS 相关理论和方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c. 第三方原则(Third party)。PSTS 不因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放弃立场，不攀附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反感被贴上“利益代理人”这一标签，在更多的情况下，PSTS 重视广泛的社会公众的意愿与利益，而不是与特定的小利益集团结盟。

d. 非自利原则(Disinterestedness)。对于 PSTS 来讲，“公共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标签，更不是一种获取社会资源的头衔，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是通过 PSTS 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被更多的人接受而“被赋予”的，PSTS 仅将之视为额外的惊喜而非最终目标。

e. 非实在论(Unrealism)。PSTS 反对将自己的观点视为“真理”，注重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原则运用到自己身上，时刻检视自己并乐意接受来自学术及社会的各种批评，PSTS 将绝对的实在论视为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拦路虎。

四 PSTS 应遵循何种发展逻辑

21 世纪，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使得人们对于“如何行动”的规范性知识的需求更为强烈，且在当前公共知识分子理念引发诸多批评的情况下(公共知识分子的泛化，异化为媒体知识分子)，未来 PSTS 发展应采取如下策略：

首先，弱化道德层面的自我虚妄性，PSTS 不过多纠缠于“能否占领公共道德高地”这一问题。对于 PSTS 来说，他应放弃追求虚妄的道德高地，并对这种所谓的“道德高地”进行了“过程”与“目的”的二元区分：PSTS 会以理想化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他无意于主动占领这一高地，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他人发号道德施令，PSTS 应将道德评估的权力赋予广泛的听众。

其次，PSTS 应更多地回归“知识”本性，一个谦逊且能够贡献有效知识的 PSTS 远比张口必“道德捍卫者”的 PSTS 更为可贵，我们强调一个能够提供“认知扩展型知识”的 PSTS 的存在。“认知扩展型知识”是能够为人们展示更多可能性，但却又不妄加评判的知识。PSTS 所应做的是扩展人们的认识空间并整合相应的权责结构，告诉人们“我们所处的整体与境是什么、我们面临哪些困境、可做出哪些选择、不同选择会面临哪些困境和机遇、又需要承担

何种责任”，“认知扩展型知识”力图将各个参与者从单纯的自我利益中解脱出来，使他们置于一个利益多元、视角多样、责任共担的综合场景中。

最后，当前 PSTS 应积极招募自己的听众，缺少了“公共影响力”的 PSTS 是不合格的，PSTS 无需绝对排斥“媒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只是需要基于无私利品质。扩展 PSTS 在社会的影响力，应注重写作方式的公共性、传播渠道的公共性、行动能力的公共性等：第一，发展新的写作策略，鼓励运用通俗性语言，可以采取伍德豪斯(Edward Woodhouse)的“双重文本(double texts)”模式，或是鲁(Roe, E)的地方性语言写作方法；^[17]第二，扩展知识流通渠道、增加文本流量，使用受众范围更广、具有更强即时性特征的知识传播媒介，丰富知识表现形式；第三，强化与公众或社会运动者之间的对话并积极参与他们的行动；第四，推进 STS 学术奖励体制的改革，适度强化对 STS 研究工作的公共问责程度，将 STS 研究者为社会公众提供新知识等纳入学术评估体系之中，缓解学术专业化所带来的压力。

强调 PSTS 理念，并非要求 STS 回避学术研究，两者不是替代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实现与 ASTS 之间与 PSTS 之间的智力转换：ASTS 研究

者通过持续地关注公共科技事件、并贡献具有公众可理解性的知识，而演变为 PSTS，而当 PSTS 将关注点重新放之于学术性问题，或是将社会场中的新经验材料进行重新的学术整合与凝练时，PSTS 又会重新恢复其学术研究者的身份，我们希望更多的 STS 研究者参与到这种“旋转门机制”里面。

五 PSTS 理念对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启示

中国的 STS 研究属于自然辩证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针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争论，其焦点主要在学科结构层面，如吴国盛等强调用“科学技术哲学”来取代“自然辩证法”，^[18]张明国、曾国屏等则提出“科学技术学”概念，要扩展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模。^[19]以上争论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但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学科结构重构，还需学科功能的适度变化，无目的的学科整合难以形成聚合力量。“PSTS”理念的启发是：近年来我国公共科技事件频发，因此可以尝试适度扩展自然辩证法的功能范围（如表 1“公共服务功能”项），聚焦公共科技事件，在“缓解公共科技焦虑、探索更优科技治理模式”目标的引导下聚合力量，这将有助于打造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品牌”性研究场点。

表 1 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功能类型及特征

功能类型	学术功能	政治功能	智囊功能	公共服务功能
功能目标	完成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目标	服务国家政治目标(我国自然辩证法初期阶段)	为特定阶层或团体决策进行咨询	分析公众所关注的科技事件，探索合理的治理模式
知识评估主体	学术同行	政府	决策者	社会公众或决策者
主要关注点	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方向	批判“唯心主义”科学等	决策者所关心的话题	公共科技事件
独立性程度	强	弱	中	强(第三方原则)
语言特征	专业性学术语言	专业性学术语言	专业性程度适中的学术语言	通俗性语言
知识传播路径	学术期刊、著作、学术会议等，较强封闭性，限于学术圈	学术期刊等，学术圈及政治圈	多采用内部资料阅读方式，传播范围限于决策圈	大众传播媒介，如网络、报纸、电视等，开放性程度高

1. 自然辩证法界在我国公共科技事件中的角色选择

借鉴小罗杰·皮尔克(Roger A. Pielk)关于科学家在决策场中理想化角色的划分理念，^[20]将自然辩证法界在公共科技事件中所可能扮演的理想角色划分为“学术人”“仲裁者”“知识转译者”和“观点

辩护者”四种(如图 2 所示)。

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界应更多地扮演“知识转译者”角色，将公共科技事件中各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彼此可交流的语言形式，降低不同参与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的成本。为何是“转译者”？首先，自然辩证法界无法成为公共科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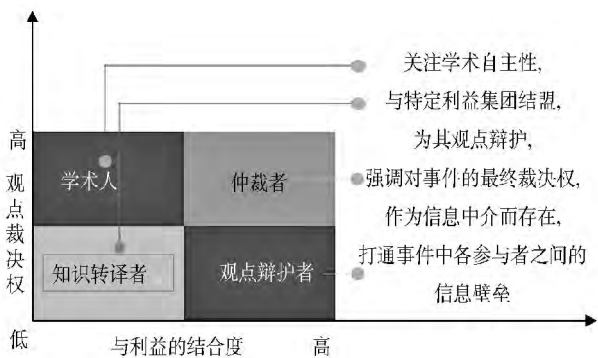


图2 PSTS在公共科技事件中所可能扮演的四种理想角色及其特征

件的“仲裁者”,这是由我国当前的决策体制(以政府及科学共同体为主导性决策群体)及公共科技事件性质本身(利益及价值的多元性)所决定的;其次,尽量避免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观点辩护者”,这会削弱其知识的客观性及说服力;再次,“知识转译者”有助于缓解公共科技事件治理过程中的关键

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共科技事件往往源于公众、科学家、决策者等之间由于信息对流不充分所造成的紧张关系:科学家往往忽视对科技成果潜在社会影响的反思与宣传,且其专业性语言往往将普通公众拒之门外;伦理学家或哲学家往往放大科技负效应,而善用传媒往往使其观点得以广泛传播;当决策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时,其决定往往饱受不必要质疑;公众往往缺乏专业辨别力,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中往往随大流式的盲信。合理的公共科技事件治理方式,应基于各参与者间正常且充分的信息对流,我们虽然并不奢望这可以使事件得以“最终解决”,但至少可以使各方保持理性品质。

2. 角色实现路径

作为知识转译者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应积极推动两种知识转译形式——外部知识转译和内部知识转译,同时强调构建基于公共传媒的新型信息互动模式(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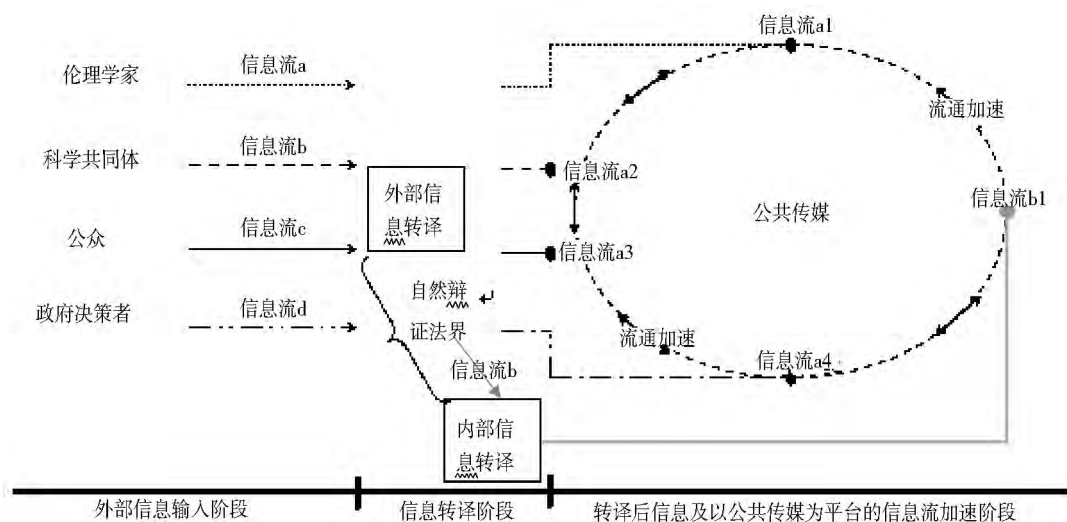


图3 作为知识转译者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功能发挥机制

“外部知识转译”主要是强化“科学共同体——公众”/“决策者——公众”/“伦理学家及媒体——科学共同体”/“伦理学家及媒体——公众”这四条信息流的运转速度和效率,如将公众的急切但却难以有效表达的焦虑转译为可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的信息流,将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性知识转译为具有公共可理解性的知识形式等。在转译过程中,自然辩证法界应尽量保持转译的客观性,避免过多的意识形态负载。“内部知识转译”即自然辩证法界将专业性术语转译为具有通俗性特征的语言形式,并努力将之整合到上述几个信息流中。

“知识转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是要通过知识转译建构一个能够使公共科技事件中各参与者

进行有效对话的平台。对当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来讲,与公共媒体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显得尤为迫切,以突破学科限制或领域限制。自然辩证法界应积极推进学科结构整合进程,强化自然辩证法内部各学科、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之间,以及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合作,联系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针对正在发生或刚发生的公共科技事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研讨会并向社会公开发表观点,形成自己的舆论阵地。当然,在与公共传媒合作过程中,自然辩证法界应保持理性反思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盲目跟风,一些媒体往往会过度夸大科技成果的负效应,自然辩证法界应对公共传媒中的不实或不严肃论断进行积极的批判。

【参 考 文 献】

- [1]福 柯. 福柯访谈录: 权力的眼睛 [M]. 严 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47.
- [2]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 [M]. 洪 洁,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4.
- [3]波斯纳. 公共知识分子: 衰落之研究 [M]. 徐 昕,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64.
- [4]Gattone C. The Social Scientist as Public Intellectual: Critical Reflec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 2006: 44 - 47.
- [5]Stevens S M. Speaking Out: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genda for Refashioning STS [J].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2008(33) .
- [6]Hammersley M. Should Social Science be Critical? [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02(2) : 175 - 195.
- [7]Bijker W E. The Need fo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pace for STS: Pre-Presidential Address [J].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2003(28) .
- [8]Cushman E.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Service Learning ,and Activist Research [J]. College English ,1999(3) .
- [9]Fuller S.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s an Agent of Justice: In Search of a Regime [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2006(2) : 147.
- [10]诺沃特尼,斯科特,吉本斯. 反思科学 [M]. 冷 民,徐秋慧,何希志,等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280.
- [11]Crick N.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2006(2) : 127 - 139.
- [12]Winner L. 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J].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1993 (3) : 368.
- [13]Cozzens S E. Whose Movement? STS and Social Justice [J].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1993 (18) : 275.
- [14]Martin B. The Critique of Science Becomes Academic [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93(18) : 255.
- [15]Waks L J. STS As an Academic Field and a Social Movement [J]. Technology in Society ,1993(15) : 401.
- [16]麦肯齐. 别把 STS 做小了: 唐纳德·麦肯齐访谈录 [J]. 黄之栋,高 璐,缪航等,译.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8) : 23.
- [17]Roe E. Narrative Policy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2.
- [18]吴国盛. 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9(10) : 65.
- [19]张明国. 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 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 [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3(2) : 11.
- [20]Pielke R A. 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 30.

STS Researcher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PSTS) : A Research Field That Should Be Pioneered Urgently

WANG Yan - yu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ru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 there is a rising voice which calls on the STS scholars to become public intellectuals(PSTS) , for which trend , the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ther the role of the STS researcher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should be intensified? What are the problem sets that the PSTS should be concerned?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knowledge that is provided by PSTS? What are the norms that should be obeyed by PSTS? What will PSTS be like in the future? By tentativ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 the paper further researches o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idea of PSTS to Chinese natural dialectics.

Key words: public intellectual; ASTS; PSTS; ethos

(责任编辑 许玉俊)